

马克思“两大发现”与现实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
两大发现 与
现实
社会主义

前 言

这套丛书设计的初衷是满足两个目的：一是作为一套专著，反映本学科同仁多年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求为理论事业的繁荣尽绵薄之力；二是作为一套研究生教材，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相对规范的教学用书。

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发现要同时体现这两个目的存在着一定困难。专著所要求的理论原创性与教材所要求的学科基本知识的包容性不易兼得。为了具有可操作性，我们遂强调以体现教材特点为主、兼顾学术特色的指导思想。尽管如此，由于各位作者在理解方面的差异，实际形成的书稿仍然存在着在两种规范之间摇摆的情况。

带来上述窘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历来是各个学科点自主确定的；即便是同一学科，在课程设置及讲授内容上往往也是见仁见智。像我们这样冒冒失失地打出出版“教材”的旗号，似乎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就无法借鉴兄弟院校得到公认的教材范本的经验。然而，我们思考一再，还是不愿意藏拙，决定把这件事做下去。这有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对象客观上面临着变化，为学科发展计，亟需横向的学术交流。我们愿意通过这套教材，表达关于教学内容改革的基本想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学科是改革之初出现的。

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三足鼎立,共同承担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任务。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本内容的话,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以它们为基础所派生出来的政治结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宏观证明或者说逻辑理论,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微观证明或者说策略理论。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确定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之后,原有的以强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不能有效地体现现实政治的要求。这种局面迫使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做出调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兄弟院校大体选择了三种发展模式:一是全面转向邓小平理论;二是演变为国际政治;三是改换成行政管理。这些选择都包含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没能完整表达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的含义。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改革,主要应该选择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方向。这一方向包含两个环节,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逻辑理论,即经济学哲学证明;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策略理论,即政治学证明。这是因为经典社会主义只论证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必然性问题,没有论证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经典社会主义只提出运用计划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提出运用市场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说,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当年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立场上去。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被肢解开来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板块,有的只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

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思考。

其次,我们学科点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已有20个年头。以前虽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有的成果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教材体系。这套丛书将基本满足教学需要。

当然,研究生教学是把学习与研究结合在一起教育行为;与本科阶段的学习相比,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更加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它除了依托学校的图书资料、师资队伍、学术氛围之外,还依靠既定的课程体系、阅读书目、社会实践等,共同形成本专业所要求的教育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教学用书,既要求表现学科的基础知识,又必须反映学术界及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何做到兼有兼得,并非易事。

除此以外,由于这套丛书与作者个人的研究对象和角度相关,我们除了对丛书的宗旨做出要求之外,还在文字总量和体例方面做出规定,并不强求观点一致,更无法体现写作风格的统一。因此,每一本书反映的都是作者自身的学术水平。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学术界同行及读者诸君能为自己的成果乃至丛书本身提出批评。

余金成

2000年5月1日

目 录

前 言	余金成 (1)
导 论 马克思主义结构形式及其发展	(1)
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逻辑论证和策略理论	(1)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常是从策略理论开始的	(6)
三、邓小平理论的时代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12)
四、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客观趋势	(21)
上编 唯物史观与落后国家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38)
一、劳动力与劳动关系理论的提出	(39)
二、劳动力与劳动关系理论的内容	(54)
三、劳动力与劳动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73)
第二章 落后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条件	(93)
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直接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共同胜利论”	(95)
二、列宁关于落后国家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 探索	(99)
三、列宁为后人留下的历史难题:落后国家能否单独建 成社会主义?	(106)
第三章 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	(110)
一、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世界大战的条 件是分不开的	(110)
二、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必然性	(114)

三、社会主义在成为理想社会形态之前应首先成为理想的发展方式	(117)
第四章 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条件	(122)
一、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民族形式	(123)
二、人类文化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	(131)
三、中国社会主义与东西方文化模式	(138)
下编 剩余价值理论与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第五章 剩余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158)
一、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确认剩余价值来源	(158)
二、马克思是从揭露剥削角度判断剩余价值来源的	(163)
三、考察剩余价值来源需引入生产资料因素	(167)
四、剩余价值源于活劳动与死劳动的统一	(170)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时代条件	(174)
一、马克思把科学抽象化为历史一般存在	(176)
二、生产资料是衡量历史一般存在的尺度	(181)
三、现代科学技术突出了脑力劳动的作用	(183)
四、邓小平科学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动	(187)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	(193)
一、新型科技革命改变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	(195)
二、新型科技革命突出了市场经济的二重性质	(201)
三、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市场经济	(206)
四、社会主义改革对市场经济的选择	(215)
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主观条件	(226)
一、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	(228)
二、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对政治权力的依赖	(234)
三、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三个层次	(239)
四、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特点	(243)
主要参考书目	(252)

导论 马克思主义结构形式及其发展

一百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是仅见的对人类社会运动形成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这一精细理论工程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为对象,以论证理想社会形态的必然性为目的,探索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所形成的逻辑结论,说服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它所提供的变革社会的策略,支配了不同民族的亿万民众。至今,体现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巨大社会发展,围绕着共产主义目标的种种理论研究,都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仍然像开始一样深深植根于人们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仍然像以往一样针对着资本主义的弊端。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每一次发生,都同人类物质生产形成的巨大进步相关。邓小平理论是晚近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它所牵动的社会实践目前正在深入进行。新的实践仍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人们深化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还没有任何其他发展阶段像今天这样,同正在变革的社会实践形成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其他理论形式,面临着如此紧迫的发展任务。然而,要准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并科学把握它留下的基本难题,必须把这一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考察。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考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逻辑论证和策略理论

像一切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身的三个环节:一是它的方法原则。马克思主义是运用唯物

辩证法来观察世界、分析对象并制定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总出发点,也是它的总原则,还是它赖以与其他思想体系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方法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环节。唯物辩证法首先在于它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它肯定自然的任何现象都是物质运动造成的,任何物质运动都是有规律的;人类是由稳定的物质系统结构而成的生命现象,社会运动是物质运动,所以,人类历史应该是有规律的。而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并把握客观规律,要求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把握这一运动。这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点,也构成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

二是它的逻辑论证。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现实问题,不是单纯反映现实,而是历史地分析现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去逻辑地预测未来,从而为现实指定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干,是它存在的基本标志。逻辑论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

在一定意义上,方法原则同样需要逻辑论证。然而,这种逻辑所考察的对象通常表现为思维本身的规律,是从人类认识史角度立论的。比较起来,此处所谓逻辑论证则是针对人类发展史的,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它运用方法原则去考察事实、分析事实,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并将之用于预测未来、确定人们实践的基本方向。因此,方法原则与逻辑论证又是相互联系的,后者是前者的应用。

三是它的策略理论。从根本上说,策略理论是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理论体系。它具有自身必不可少的方法原则,具有自身不可或缺的逻辑形式。就方法原则而言,策略理论与逻辑论证是完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理论和逻辑论证都运用唯物辩证法。双方都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其区别主要在于,策略理论考察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针对特定时代条件、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为特定的社会主体提供从事实实践活动所需要的战略思路和策略路

线：逻辑论证则考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宏观上对人类整体发展提供说明和描述，其结论具有广泛的时空涵盖力和总体性、综合性特点。策略理论包含了通常意义的战略和策略两方面内容，属于直接的实践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环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从头脑中编织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和实现理想社会的策略；而前者是从社会物质生产所呈现的客观要求中去预测新的社会，是从“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中寻找关于实现新社会的策略。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这种联系注定了它必然具有的开放性。

人类实践是连续过程。其间，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会不断发生变化，人们会不断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前途的预测也不得不作相应调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理论活动都是从现实出发的，也都是以现实为归宿的；然而，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又都是以理性为先导的，或者说，是以理论为形式的。理论源于历史中的实践又高于它，因而能够指导现在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超越自身，因而能够修正既定的理论。实践与理论的这种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互为前提、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只能在人类发展的总过程中才能被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认识显然应该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上述关系。

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进行：一是策略理论层面的；一是逻辑论证层面的。两种发展的区别显而易见：策略理论的发展仅仅源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所调整的是战略模式和策略步骤，例如同为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是城市武装起义，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过去运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现在运用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而逻辑论证的发展源于时代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所调整的是关于社会主

义必然性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发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区别清楚的。无论是策略理论层面的发展,还是逻辑论证层面的发展,都是从解决所面临实际问题开始的,因而都具有策略方面的意义。问题在于,来自策略方面的突破,在实践中将不断深化自己的原则,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如果现有的逻辑论证无法包容这种发展,无力解释新出现的事实,它本身就需要改变了。

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判断就必须这样。

邓小平直接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现实,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出现的必然性在于: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策略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另寻他途。

在最初,邓小平理论被视为与经典社会主义的逻辑理论一致,人们尽可能寻找两种理论之间的逻辑对接关系;然而事实证明,由于总体条件的变化,要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此时的最佳策略应当是“不争论”。“不争论”策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一方面,它填补了一种新生理论体系在一段时间内未臻完善的缺憾,使这一理论得以完整面貌示人,因而不致影响其在实践方面的应用;另一方面,它提供了邓小平理论与经典社会主义逻辑理论之间的磨合机会,当客观上无法使双方达到一致的时候,人们反而能就此形成一种共识。这将减少探索新的逻辑理论的障碍。

在此问题上的最大困难将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种在实践中发挥了如此重大作用的理论居然没有形成自己在逻辑论证方面的支撑,那么,人们又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呢?要解决这一认识问题,只能从人类一般认识规律的角度来判断,这里需要确定两个前提:首先,一种创新理论的提出,必然有一个完善过

程；而它对实践的依赖，又使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同社会热点及难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看到，既为“热点”，就是社会矛盾积聚之所在；大的、长期的“热点”问题同时构成了“难点”问题，又进一步体现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人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往往已经在理论上作了比较深入、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实践上作了比较认真、比较全面的工作。但如果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没能走出困境，这就意味着，现有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模式，从总体上不适应事物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无法解决面临的矛盾。人们必须从更深层次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渠道。

一般说来，事物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能获得突破性进展。此时，由于矛盾的诸方面已经充分展开，解决矛盾的实践经历了诸多尝试，新的实践模式的形成将更少片面性，也将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是，以实践作为突破形式的社会发展，其理论内容也往往是围绕着实践展开的。实践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品格，注定了它将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发展。新的理论只有依据实践的启迪，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突破，并最终形成完整的逻辑架构。其次，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独立特行的思想体系。这种地位决定了它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它所具有的划时代理论涵义，往往是采取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往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背景。事实上，人们不能奢望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的理论，一下子就能取得一个十分清晰的面貌。这样既不可能、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要在一个庞大思想体系中表达时代的客观要求，新理论刚开始必然带有原理论的种种痕迹，其发展只能是渐进的、逐步的。从整体上推行新的理论，只有在逻辑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后，这意味着这种理论将到达其发展的新时期。

一旦新的理论能够为自身早已开始的实践提供完整的逻辑论证，就将为这一实践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常是从策略理论开始的

从本质上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属于整个人类进步历史的晚近部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始终不满足已有的成就,始终对现实持一种批判态度,始终在设计更为美好的未来激励自己。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生以后,这种努力就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通常被认为体现在十九世纪初的三大空想家身上。但无论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还是英国的欧文,尽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深刻批判,对理想社会作了精采描述,并且对组织新社会作了大胆尝试,却没能找到推翻旧制度、实现新制度的社会主体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解决了这个问题。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了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应该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而代之;阶级斗争则表明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对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的发现,明确了资本主义在人类总体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揭示了无产阶级从中形成的历史根源;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发现,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寻求解放的必然性。而无产阶级作为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其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以自身严密的逻辑性,说服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吸引了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引发了波澜壮阔、历久不衰的社会变革运动。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那

么,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式,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呢?

列宁主义的诞生解答了马克思主义留下的问题。

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贡献是创建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转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按照列宁的思路,世界大战的形势从两个方面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先进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预想:一是它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联手遏制无产阶级斗争的状况,致使单独一个国家也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它导致落后国家在面临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民族矛盾,使其成为斗争的焦点,造成了由这些国家率先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列宁设想,落后民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应努力点燃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最终造成双方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

问题在于,列宁的设想仅仅实现了前半部分:落后的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发达国家却没能跟上来。直到今天,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仍然是比较落后的民族。

这一事实具有挑战性。这种挑战在理论领域表现得十分尖锐。人们不得不面对一道难题: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社会主义将率先在先进国家实现,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首先由落后国家来建设这一现实呢?

严格说来,列宁并没有对此作出回答;因为他的十月革命实践没有打算否定马克思的上述基本理论。与此相关,正因为列宁主义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理论上的预期,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也只能属于策略意义上的发展。

必须承认,至少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中,社会主义者并没有鲜明地提出过上述问题。这有两个理由可作解释: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建设事业在进步,国力在增强,各种探索性的努力在继续,并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落后民族没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在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在扩大,选择和拥护社会主义方向的力量在增加,而资

本主义却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殖民地,按照这种趋势,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发达国家有望爆发革命,最终形成列宁所预言的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共建社会主义的局面。

后来的变化尽人皆知。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型科技革命逐渐显示了它变革社会关系的巨大力量,乃至从两个方面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一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重又拉大。资本主义利用自身丰厚的经济文化基础,占据了这次科技革命的潮头,在六七十年代迅速革新了社会生产力,不仅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客观上也映衬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迫使后者走上改革之路。二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掌握了核武器。这种武器所具备的毁灭能力,使双方的暴力对抗走进死胡同。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和平共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除非其内部发生变化,否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纯运用暴力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承认:在一个可以预计的时间内,很难期待发达国家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这意味着,列宁关于落后民族与发达国家共建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是无法实现的。

这同时意味着,要使社会主义重新对人类产生吸引力,必须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全面发展之后。这与以前不同。当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其吸引力往往是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人们仅仅由于对现实不满,就可以去选择一种新的发展目标。而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其吸引力只能依靠它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超越。换句话说,当今天发达国家在未来某个时候被社会主义所吸引时,它往往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变得落后了。因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发达国家实现的预言,过去不曾实现,现在无法实现,将来也不会实现。

那么，如何认识落后国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呢？

这一事实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如果把它视为偶然现象，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不采用经典社会主义的有关原则提供辩护——因为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能硬套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总体上处于尴尬境地——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主义者所实现的一切，在起点上只不过源于历史巧合，很难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确定相应的位置。

如果把它视为必然现象，一方面，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把改革所取得的进步看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看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能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只是在实践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只是在策略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没有完成对新的实践的逻辑论证，还需要从基础理论方面去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两种判断之间的冲突，而把相互矛盾的结论强行统一在一起。但是，实践本身会显示出这种矛盾。正如理论界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维持了一种理论体系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历史与逻辑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实践方面显现，一个是从理论方面显现。在理论方面的不足必将在实践领域表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有着与当年布尔什维克相似的处境：都从策略理论层面突破了经典社会主义的框架，都隐含着需要进一步修正其逻辑论证的任务。双方区别仅仅在于所面临的时代条件不同，因而亟待解决的逻辑论证问题不同。

当落后的俄国——而不是若干先进国家——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列宁只是从策略意义上肯定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这无可非议：一方面，人们（包括列宁本人在内）还没有条件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即使个别人物把握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在绝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原有理论认识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公

开地揭示这一本质。一个民族对一种理论的认知和接纳程度，跟这一民族的现实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如果强行改变这一点，哪怕他不怕孤立，并甘冒陷入一场无休止争论的危险，也将无济于事。对列宁来说，除了实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与思维严密且深入人心的经典社会主义的逻辑论证相抗衡；而此时的实践刚刚展开，它因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具备可信的说服力。列宁只从策略方面肯定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这是人类历史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特殊时期。

换句话说，当前人的定论还严重地束缚着大多数人们头脑的时候，面对时代条件的根本变化，执政者有必要在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不搞争论，运用“看准了的，大胆试、大胆闯”的策略原则，果断地在实践领域取得突破，用“发展”这种“硬道理”去说服人们，迅速开创新局面。

当然，绝对“不争论”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做到不主动挑起争论，对已出现的争论持一种淡化态度。在这方面，强调对前人成说的变革是从策略层面进行的，往往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至少是换取持不同意见者的沉默，从而有效地赢得在实践领域内的发展。

如前所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可以是策略层面的，又可以是逻辑层面的；而无论前者或后者，往往都必须从策略层面上做起。

列宁从策略层面对经典社会主义的修正，被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忠实地接受下来。在一定意义上，列宁关于落后民族需与先进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逐步被演变成为一种致力于与资本主义实行对抗的国际关系战略。它不仅左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它们的经济建设模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东欧后来的巨变，最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一战略模式的失败。

邓小平理论的崛起，是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的。这一命题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分离开来，也是宣告了与这种模式的决裂。

然而，邓小平理论对市场体制的选择，又一次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境地，又一次涉及到与经典社会主义逻辑理论的关系问题。无独有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从策略方面立论的。

但是，人们很快在实践中发现：不仅公有制与市场体制的结合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而且初试市场经济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它自发地、大批地、每日每时地张扬优胜劣汰的利益机制，生成着以金钱为核心的精神追求倾向。这些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在更深层次上去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结合。

显然，上述结论没有动摇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也不意味着中国改革实践陷入了误区；如果那样看问题，不仅有违二十年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且不符合人类历史进步（包括理论形态的进步）所呈现的规律性事实。但上述结论的确表明，仅从策略理论层次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同时从逻辑论证层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已无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入发展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就绝不局限于它给当代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局限于它为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提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基本路线；更为值得称道的应该是：邓小平理论从实践方面强行拉动了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思考，中国社会主义者借助于这一理论工程的完成，不仅能够把邓小平所开创的伟业进行到底，而且导致马克思主义重新与当代人类进步的潮流相融合，使其再度成为人类驶离资本主义雾海的明灯。

当年，列宁主义曾遇到了这种历史时机，但列宁的后人错过